

古交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太原市古交工矿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坚持对敌斗争，把敌人挤出去

忆晋绥边区第八分区在抗日战争中的斗争生活

.....罗贵波（1）

外国记者在晋绥八分区.....罗贵波（14）

中顾委委员、原山西省省长罗贵波同志

在古交工矿区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和纪念

碑座谈会上的讲话.....康振仁 整理（23）

回忆古交完小师生参加保卫延安战争经过.....同克一（28）

交城县二完小业余剧团一九四七年春节文艺宣传

活动总结.....区志办供稿（37）

我对交城县第二完小业余剧团一九四七年春节宣

传活动的回忆.....李有魁（42）

对西阳曲县民政工作的回忆.....曹志宓（45）

回忆我在西阳曲县搞贸易、税收工作的一些情况

.....韩俊杰（52）

日寇堂膝小队的覆灭.....杨 军（58）

李家社惨案追述.....康介荣（63）

赵希敏.....寇建国 康永安整理（66）

回忆烈士王锡九同志.....宋立华（69）

缅怀李廉寿同志.....韩俊杰（73）

赵承辉.....寇建国 康永安整理（75）

张长栋.....寇建国 康永安整理（76）

民主革命时期我区党组织建设概况.....区党史办供稿（78）

坚持对敌斗争，把敌人挤出去

忆晋绥边区第八分区在抗日战争中的 斗争生活

罗 贵 波

(一)

晋绥边区八分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地处同蒲铁路忻（县）平（遥）段以西，平（遥）汾（阳）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以北，离（石）岚（县）公路以东，忻（县）静（乐）公路以南，中贯太（原）汾（阳）公路，是晋绥边区的南大门，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一九四一年，日军回兵华北，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敌人为了控制八分区，魔爪伸向了晋西北，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侵略军除在太原驻有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外，在汾阳、离石、东村还驻有日军的三个旅团部，最少四个大队，兵力达四千余人，此外，还有两千多名伪军。这些日伪军不但分布在铁路、公路沿线，还在平川、边山及山区主要城镇和村庄都建立了据点碉堡，计二百一十余处，对八分区形成包围、分割和封锁的局面。并在晋中平川占领区疯狂推行所谓“强化治安”，对我山区根据地和边山游击区残酷地扫荡，疯狂地蚕食，首先在八分区辖内的协和堡、牛家垣、孝子渠、王家庄、东社、马坊等地建立据点八处，犹如八把铁锁，锁住了汾（阳）、文（水）、交（城）、清（源）、太（原）整个边山，敌人用“扫荡”“蚕食”的罪恶手段，紧紧

地控制了山区通往平川的交通要道。

到一九四二年秋，敌人又在草庄头和交城、离石山区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等五个要害处扎下新据点，似插入我根据地心脏的五把“尖刀”。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使交、文、汾山区的中西川，东、西葫芦川，头、二、三道川、屯兰口和西冶川的群众被杀害、牲畜被抢光、房屋被烧毁。仅仅在一九四二年的冬季扫荡里，双家寨就有多家群众被杀而绝了后；敌人到翟家庄一次就刺死几十个男、女村民；在百草庄用刺刀捅死几个妇女还不“过瘾”，就将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掷向空中，然后用刺刀尖“接住”这个婴儿的心脏；二道川仓儿会一村被杀剩下的还数不到十个人！三道川的中庄被刺刀穿死的妇女就有二十多个……浓烟过山，火光漫天，烧杀奸淫，惨绝人寰，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到一九四二年底，八分区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区仅剩距敌据点较远的十七个行政村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一百多个自然村。敌人对我山区根据地实行的经济封锁，使我抗日军民人力物力的来源十分困难，干部、战士穿不上棉衣，吃不到油盐、蔬菜，营养严重不良，体质愈来愈弱，许多人患了夜盲症，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部队的活动被局限于关帝山周围狭小地区。延安通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的通道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斗争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发电给晋绥分局：“要迅速检查根据地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同志“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部署，发出《关于加强敌斗争的指示》，调整了八分区的领导机构。

八分区根据上述精神，研究部署了我们今后的任务。大家认为，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根据地面积缩小，困难虽然很多，但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内建据点，修碉堡，残暴蹂躏人民，激发了根

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仇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一定要葬送入侵之敌。我们首先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和指示交给了干部群众，使之变为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把“敌人挤出去”是我根据地军民斗争的核心。我们将岔口、芝兰等据点作为重点，首先使这据点的敌人成为瓮中之鳖，把他们围困住。

全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调整了各县的领导班子，选调能文能武的干部担任县委书记，交西、交城、离东等地部队团（支队）的领导干部也参加县委，县委统一领导全县党政军民的对敌斗争。

交西、交城、离东各县委组成强有力的武工队，围困岔口、芝兰、草庄头和归化、榆林山据点。其它工作都围绕着中心任务而行动。三支队在交西县，二十一团在交城县，五支队在离东县，各以一部分实力配合当地干部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共同对敌。实行精兵简政，精简了地、县党政军民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充实连队，加强基层。

将原四、五、六团整编为五、六两个支队，将原二十一团，整编为一个营。从部队中抽调一部分人、枪，组成若干小分队，进入边山和平川，配合当地的党政干部和游击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和反“强化治安”斗争，开展地方工作。还从部队中调拨一部份武器，帮助和加强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

（二）

岔口、芝兰据点扎在交城山区通往边山和平川的咽喉要道上，东和草庄头、古交两据点接应，西与归化、峪口等据点相联，要打开山区对敌斗争的局面，必须拔掉这两颗“钉子”。我们围困敌人的第一步，是按照贺龙同志指示，同敌人斗争要主动积极，机动灵活，要打得准，打得狠。当时，敌人十分猖狂，十

几个人就敢窜离据点对我军民进行袭击和烧杀抢掠。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分局给部队下了命令，不许到据点十里以外活动，分区指挥机关也进驻到据点附近村庄。敌出则打，大股零敲，小股全歼。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农历正月初三）清晨，岔口敌人出来抢劫，我主力部队和交西县大队民兵，在石沙庄打伏击，歼灭日军小队长等共二十八名，俘日军军曹藤田正一。战后，我们把遗弃的敌尸，穿戴整齐，装了宣传品，由群众送进岔口据点。据在现场的我地下工作人员汇报，敌军看到被我送回尸体后，感到很吃惊，有人伸出大拇指悄悄地说：“八路的，大大的好。”石沙庄战斗后不久，我军又袭击了岔口据点，歼敌四十余人，俘伪军一个小队。战斗结束后，我们对俘虏的伪军进行教育，并全部释放。有个伪军小队长，平时作了不少坏事，我们同样放他走，对伪军震动很大，他们说：“八路军对这样的人还宽大，我们更没事了，回家算了。”

贺龙同志曾经讲过，对敌人，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把他打痛了，他就怕你。事情的发展正是这样。三个多月时间，我军民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歼灭日伪军三百六十多人，使横行无忌的敌军只好乖乖地紧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外出。

军事上的胜利为其它方面的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汉奸、特务和反维持的斗争，搞掉了一个四十多人的特务网，断绝敌人的物资来源，挖掉敌人的耳目，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我们还选派了一些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进行工作，对打击敌人、围困敌人起了很大作用。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一九四三年二月底，我部队和民兵先后掩护岔口、芝兰据点周围十五里内的群众全部搬了家，使据点周围成了“无人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这些搬到根据地内的群众同民兵组成了劳武结合的抢耕队，把岔口、芝兰据点周围许多土地种上庄稼。这种人民战争的奇迹，是侵略者们始料不及的。

敌人被围困起来了，吃用都靠运输队补给。我们的部队和游击队、民兵就选择在由东社到岔口和芝兰的交通线上，伏击敌人的运输部队。有一次战斗还缴获日本天皇的“御酒”、“御烟”。天皇陛下的慰劳品，未能“犒劳”陷入困境的日本侵略军，却“慰问”了我们的抗日英雄。部队拿出一部份武器弹药帮助加强游击队和民兵，并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帮助他们在战斗实践中锻炼提高，使民兵和游击队迅速成为能独立作战的群众武装力量。民兵和游击队在斗争中，大大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许多奇迹，并涌现出了段兴玉、崔三娃、韩凤珠等闻名晋绥边区的民兵英雄。这些普通的庄稼汉，为把敌人“挤出去”，积极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人。他们就地取材，用木炭、火硝和硫磺制成火药、用废钢铁、石头作外壳，制造各种土地雷，在敌据点周围和交通线上大摆“地雷阵”，炸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民兵还把粗大的榆树截断挖空，装上火药、铁沙和石头，制成了一时威震敌胆的“榆木炮”，架在距敌碉堡很近的山头上，伺机狠揍敌军。有一次，岔口据点的敌人出来晒太阳，民兵瞄准就是一枪，晒太阳的敌人没享受到太阳的温暖，却见了“阎王”。民兵还开展冷枪战，敌人一露头就打。有好几次，一些出来大便的日本兵，刚一蹲下就被民兵神枪手打伤、打死。据点里的敌人出来活动愈来愈困难，弹药物资补给也愈来愈困难。武工队和民兵日夜在碉堡四周轮流监视，扰袭敌人，岔口、芝兰的群众发出了豪言壮语，不让敌人“喝上交城山的水，烧上交城山的柴”，他们把死猫、死狗和剪碎的头发扔到水井里，民兵在碉堡周围的山头、沟壑和山径里都埋上了地雷，整得敌人守着青山没柴烧，守着水井没水喝，困在阴森的碉堡里一筹莫展，再没法呆下去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岔口、芝兰的敌军在文水和东社据点敌人的接应下，炸毁碉堡，狼狈而逃，我们终于挤出去了这股敌人。

挤走了岔口、芝兰据点的敌人，地里的庄稼这时也快熟了，群众欢欣鼓舞，重返家园劳动生产。他们热情地慰劳子弟兵，子弟兵也积极地帮助群众重建家园。那种军民亲如一家的情景，至今想来还分外亲切。

一九四三年九月，我军民相继除掉了草庄头、榆林山据点，八分区山区腹地的三分之二获得解放，敌我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

(三)

山区的斗争局面打开了，我们接着向边山和公路沿线推进，向晋中平川发展。我们部队进入边山、平川和公路沿线，配合当地党、政、民干部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反“蚕食”、反“强化治安”的斗争，开展各项地方工作。

当时，汾、文、交、清、太边山，由于敌人实行“蚕食”政策，建立了许多据点、碉堡和维持会等，并实行了经济封锁。晋中平川日伪据点星罗棋布，军警宪特，样样俱全，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伪政权，特别是经过“强化治安”的地方，实行了保甲制与清查户口制，发了“良民证”、“身份证”、“活住址”等，日伪对占领区人民统治相当严密，手段十分凶残。我地方干部开展工作和部队活动都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撤到山区，留下的人员和武装力量转入地下活动。由山区通往边山、平川的交通联络和运输区非常困难。但是，人民是不甘受敌人奴役的，也不愿当亡国奴。我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袭击和围困敌据点，伏击、袭击敌人的交通运输部队和出来抓人、抢粮、烧、杀、抢、掠的敌人。

我清太部队几次攻进敌人的心脏，打下了乔武和太原近郊的

白家庄据点，把敌人“采炭株式会社”搞得几天不能生产，从而使太原的炼铁厂、兵工厂，好多天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转动，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

四月下旬，汾阳之敌一部分南调豫北。我军乘机袭击了汾阳城的外围据点大营盘，歼灭敌军八十多人。

我主力部队一部分和汾阳县、文水县游击队、民兵，在宋家庄和赵村沉重打击抢粮之敌，歼灭大量敌伪军，我文水县游击队长石尚英同志就是在赵村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他在一周内，率领部队四次伏击、袭击，狠狠打击了敌人。我主力部队在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以及地方工作同志的配合下，对乔武、马坊、协和堡、利润、北格、晋祠、开棚、信义、安定、李家山、坡头、王晋庄、侯家坞、孝子渠、南堰、大王、白石、庄化、义安、宁固阜等据点实行了围困和不断的袭击，其中，协和堡、开棚、信义、安定、丰润、乔武、马坊、北格等据点相继被我军民一度攻克。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士气越来越旺，巧妙灵活地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坐卧不安。经过我军民的围困袭击，平川和边山又有二十多个据点的敌人相继被挤走了。

锄奸反特，无论在边山、平川都是发动群众开展反“蚕食”、反“强化治安”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汉奸特务是日伪的帮凶、耳目、爪牙。有些汉奸特务是我们抗日队伍里的投敌叛变分子，他们对群众危害最大，最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工作和部队活动都有很大威胁，所以群众对他们最痛恨，我们坚决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锄奸反特政策，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分子。对于那些愿意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汉奸特务则实行宽大。例如：张彪，曾任我区政府助理员，后投敌叛变充当特务，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曾带领敌人捕捉并杀害了我们四十八个同志。对这个罪大恶极的汉

奸特务分子，我抗日政府就将他处以死刑。孟守信，曾任我县公安基干队副队长，投敌叛变后充当敌徐沟县“扫共队”副队长，他把我们许多地下关系向敌人告发，使我们地下关系遭到破坏，对群众也作恶多端，后来也被我抓住处决。有位小名叫“二讨吃”的，给草庄头的敌人当了便衣特务，一九四三年在我围困草庄头时，被争取过来，并带伪军一个班起义投诚。他从敌人内部积极和我们配合，对拔掉草庄头据点起了大作用，后来担任了我交城游击三大队排长。

对平川的伪政权（区、村）和边山的维持会，凡我们力量能控制到的地方，就坚决把它摧毁，恢复建立抗日政权，否则，就使之成为“抗日两面派”的“伪政权”和“维持会”。一方面他们要为敌人办些事，应付敌人，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办事。为了便利工作和斗争，我们选派了一些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去当“伪村长”、“村副”、“维持会长”和区助理员、村警等。

当时，汾、文、交、清、太边山的敌人禁止敌占区人民把粮食、布匹、棉花、药品、通讯器材等物资运进山区根据地，也禁止根据地人民向敌占区人民出售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对敌人的这种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动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外，还发动群众，动员部队，把敌人从平川抢去的粮食和仓库中的粮食夺回来，除分给群众一部分外，其余由部队担任警戒，掩护群众和运粮部队，绕过敌人的据点，冲破敌人的封锁，把粮食和其它物资运往山区。这样经常遭到敌人的伏击、袭击和破坏，我们就广泛地利用敌伪人员和他们家属的关系，利用商人关系，从太原、榆次、汾阳、平遥等城市购进布匹、棉花、医药、器械、通讯器材等，也向敌占区人民出售一些山区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整个对敌斗争中，我们都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一面从军事上狠狠打击敌人，一面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对伪军和

伪组织人员，我们抓住一切时机，利用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给他们送宣传品，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抗日形势，还开展了“红黑点”运动，给他们建立功罪登记簿，他们做了好事就给记上“红”点，做了坏事就给记上“黑”点，并向他们公布。被记过几次“黑”点的人，常常坐卧不安，急着想找出路。我们严格执行宽大与严惩相结合的政策，能争取的就尽力争取，对死心塌地、作恶多端的家伙则坚决予以镇压。文水县一个伪区长，外号叫“刮地皮”，横征暴敛，媚敌求荣，群众恨死了他。他自知罪恶深重，怕我镇压，不敢轻易露面。但是，据点并不是他的“保险柜”。一天，我五、六名游击队员乘日军休息，伪军出操的空子，化装成宪兵，骑着自行车，一溜风似地进了他的区公所，召集起他的人马后，宣布我们是八路军，当众处决了这个坏家伙。政治攻势的开展，使伪军中不断有人持枪反正，有的整班，整个小队投诚过来；许多伪军和伪人员向我靠拢，有的为我军购买药品、器械，有的偷偷给我军送弹药，有的给我们送情报，有的为我们做内应，帮助配合我军攻克据点。据统计，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伪军、伪人员配合我军攻克的据点达四十七处。对洗手不干的伪人员，我们给他们“安全通行证”，让他们回家；对反正有功人员，为防止敌人杀害，我们对他们妥善安置。我军攻克利润日军碉堡时，我们派到日军碉堡内当伙伙的一个内线，乘敌人到伙房吃饭之机，把日军作为警戒的军犬关在屋子里喂食，他悄悄打开堡门，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将碉堡内九名日军全部俘虏。后来我们把那位伙伙同志的全家安置到了解放区。我们这样做，使一些反正人员很受感动，说“你们想得真周到”。

我们的政治攻势在日军中开展的也有成效。一九四三年中秋节，我们开展了向日军据点散发宣传品、喊话、送慰问袋等活动。慰问袋里装有食品、日用品和日本在华反战同盟印制的传

单。以后逢年、过日本的樱花节，我们都这样办。日军士兵拿到慰问袋，最感兴趣的是里边的传单，他们把传单藏起来偷看。一九四四年，朝鲜独立同盟的史进、李权武同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永井加腾、西村大谷同志先后来到八分区，帮我们做日军的工作。他们通过喊话告诉日本官兵“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打不赢的，太平洋战争注定要失败，战争中得利的是日本军阀、财阀，受苦的是士兵，日军彻底失败之时，正是你们返回日本和家人团聚之日”。后来，据我们内线关系报告，当时听了喊话的日军官兵，私下议论纷纷，有的说：“八路军中的日本人说的是实话，真心话”。吴城据点的一个日本士兵听了喊话后带枪跑到离吴城二、三里的一个小村子，要找八路军里的日本人，没有找到，就在碉堡下的山沟里自杀了。一九四四年东社伏击战中，我们俘虏的一个日军技术人员俘泽寺太郎，他提出要回去，我们释放了他，对日军影响很大。配合军事斗争的政治攻势，促进了日军厌战情绪的发展，争取和瓦解了大批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对于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多次表扬了八分区，并向各分区转发了八分区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报告。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八分区的对敌斗争环境非常艰苦，战斗非常频繁，又逢党的七大正准备召开，许多代表要经过八分区去延安参加大会。同时，还有许多干部要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延安派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干部都要经过八分区接送。接送干部成为八分区艰巨、繁重的任务。军区对交通护送任务也非常重视，给予大力支持。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也积极帮助、保护过路的干部，地方党、政、军、民干部和交通队员认真负责，勇敢机警，精心安排，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我们的代表和干部通过平川时，做到了吃饭有人做，需要牲口有人伏，走路有向导，住下有人保护，走地下交通线有人帮助化装，办理证件和护送。敌人企图阻碍破坏我们的交通线，没

想到就在他们的“治安区”里，我们构筑起了一条“钢铁走廊”。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杨尚昆、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陈赓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近三千多名干部，就是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通过的，有时由于情况变化，还需在平川停留暂住，刘少奇同志就因故在平遥县任庄安全停留了三天，还向负责护送的同志作了关于发动群众的重要指示。陆定一同志在文水南贤停留时，也给当地的干部做过一次报告。

这条“钢铁走廊”往延安运输了大量重要物资，八分区军民还是保证运输的钢铁运输兵。

平川和边山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我们的前线，有力地配合了山区的对敌斗争和发展生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敌人越是困难，越是接近灭亡，就越是要加紧镇压，加紧掠夺，作垂死挣扎。但是八分区军民并不松懈斗志，仍然坚持对敌斗争，把敌人挤出去，为反攻做好准备。

(四)

经过我八分区党政军民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到一九四四年秋，我们已经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八月下旬，晋绥边区展开了对敌秋季攻势，我主力一部首先拔掉忻、静公路的丰润据点，打响了秋季攻势的第一炮。九月初，八分区部队连克房山的马坊镇、开府两据点，消灭敌伪一百七十多人，迫使伪军一个中队投诚。之后，我军又相继攻下峪口、横泉、圪洞等据点，消灭了大批敌伪军。

这时，由美军少校卡斯堡率领的外国记者团，由延安到晋绥边区参观。八分区奉命接待了这个记者团。他们是：《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

道，国民党中宣部一个姓张的作为顾问随同前来。

这个外国记者团，在我八分区经过长达二十天的参观访问，特别是亲眼观看了我军袭击敌人并攻克协和堡据点的战斗，终于确信我军确实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对没有飞机、大炮的八路军能很快拿下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赞不绝口，连连说：“奇迹！奇迹！”后来，这个记者团向全世界报道了他们的见闻观感。

记者团满意地离开了八分区，我们的对敌秋季攻势仍在继续。在忻岚公路上，我军攻进了敌人的粮库——石河据点，掩护群众夺回粮食数十万斤，在静乐一带，用坑道外破法攻克了静乐县重镇娄烦，歼灭敌人八十多人，吓得东六渡、下静游两据点的敌人跑到静乐；九月底，我主力部队又袭击了交城的东社和五元城据点，歼敌一百多名，胜利地结束了秋季攻势。

在这次秋季攻势后，我军民先后消灭了敌伪军近三千人，挤掉和攻克了岔口、芝兰、草庄头、榆林山、归化、青沿、开府、马坊、协和堡、宁固阜、义安、庄化、司马、大王、孝子渠、津良庄、娄烦、大武、小店、丰润等数十个据点，敌人被挤到一些主要交通线上，离岚公路被我拦腰斩断，八分区和三分区联在一起了，敌占区大大缩小，根据地大大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也由两千四百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扭转了八分区的严重局势，保证了延安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八分区对敌斗争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晋绥分局发了电报，表扬了我们的工作，要求晋绥边区各分区都要“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晋绥边区在一九四四年底召开的群英会上，赠给八分区党政军民一面锦旗，上面写有六个大字：“把敌人挤出去”。

毛泽东同志和晋绥分局，晋绥军区的表扬，进一步鞭策激励了我八分区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豪情，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对敌斗争指示，和兄弟分区部队互相配合，英勇作战，向敌人

发动了一个又一个攻势，拔掉了敌人的一个又一个据点，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这个胜利是伟大的，但又是来之不易的。为了赢得这个胜利，许多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中，先后有五千多位同志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八分区的土地上，其中有专员顾永田，分区副司令员刘德明，副参谋长吕怀忠，团长王何全，支队长周平、谭公强、刘森唐，县委书记胡光，县长王冰、周洪涛，分区作战科长越永德，区委书记杨振国，区长贾石亭，劳动模范杜葆元，游击队英雄蒋三、蒋四等同志。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抗战胜利四十二年了。四十二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两国人民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已经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这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意愿和根本利益的。中日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都需要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为维护世界和平，使中日两国不再兵戎相见，两国人民不再遭受战争灾害的摧残，我们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一九八七年七月

注：罗贵波同志当时任晋绥分局八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外国记者在晋绥八分区

罗 贵 波

一九四四年仲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部分外国记者，到晋绥八分区参观采访了我根据地军民坚持开展敌后斗争，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实况，向国内外作了大量报道。彻底戳穿了哪些污蔑我共产党、八路军的谎言，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一九四四年，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第七个年头。日本侵略者正在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而我八路军、新四军却在敌后抗击着百分之五十六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但是，在大后方，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却不为世人所知。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听到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造作谣言、蒙蔽舆论的欺骗宣传，什么共产党、八路军是“奸党”、“奸军”，什么八路军“未抗战”、“游而不击”、“没有俘虏”……。谣言毕竟不是真理。有心人总不免要想一想，共产党、八路军既然“游而不击”，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存在下去？日伪军的“扫荡”消灭不了他们；“铁壁合围”摧不垮他们；“经济封锁”困不死他们；“三

光政策”也没有把他们烧光、杀光、抢光。当时，驻重庆的一些外国记者，虽然从八路军办事处获得一些我党、我军在敌后英勇抗日的消息，但更想到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看，获得第一手材料。许多外国记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赴延安采访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害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世后，戳破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诬蔑与谣言，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对这一要求千方百计予以阻挠。最后迫于压力，只好同意了外国记者到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采访的要求，并指派国民党有关官员和一些中国记者随行。一个二十一个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就这样组成了。

参观团由重庆启程后，先到西安和山西吉县克难坡阎锡山的驻地进行了参观采访。在那里国民党官员依然是老调重弹，向中外记者进行“共产党、八路军始终未抗战”的欺骗宣传。此后，参观团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抵达延安，在延安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参观采访，耳闻目睹了我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伟大作用。八月二十日，参观团的部分成员抵达晋绥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参观采访，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为了满足外国记者想亲眼看看我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开展对敌斗争，如何打击敌人抓俘虏，缴获敌人武器，以便以亲眼目睹的第一手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向世界人民报导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的愿望，安排记者们到我八分区进行了参观采访。

九月六日，三名外国记者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武道（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国民党中宣部官员张潮生，在我方人员王世英、柯柏年、凌青、贺彪、郁文、林仲、李绍堂等同志陪同下，来到我晋绥八分区。我们带领